

辛亥人物群像

蔡思行 彭淑敏 區志堅 編著



中華書局

辛亥人物群像

蔡思行 彭淑敏 區志堅 編著



中華書局

□ □
裝幀設計：映川
責任編輯：李婧琳

辛亥人物群像

□
著者
蔡思行 彭淑敏 區志堅

□
出版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鰲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
電話：(852) 2525 0102 傳真：(852) 2713 8202
電子郵件：info@chunghwabook.com.hk
網址：<http://www.chunghwabook.com.hk>

□
發行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
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 傳真：(852) 2407 3062
電子郵件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□
印刷
深圳恒特美印刷有限公司
深圳市寶安區龍華民治橫嶺村恒特美印刷工業園

□
版次
2011 年 7 月初版
© 2011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□
規格
特 16 開 (230 mm × 170 mm)
□
ISBN : 978-988-8104-92-5

辛亥人物群像

胡鴻烈敬題



序一

辛亥革命為 20 世紀中國之頭等重大事件，此乃國史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革，即中國之傳統與現代之重要分水嶺。就政治而言，由帝制而共和；就經濟而言，由農業而工業；就社會而言，由男尊女卑而男女平權；就學術而言，由儒學而西學。由是以降，中國之政教經濟文化，遂見中西涵濡，而由一舊中國轉變為一新中國。

回首百年前之辛亥，中國時為列強所瓜分，滿清無力應對，國既不國，繼二次鴉片戰爭（1858–1860）後再有八國聯軍之役（1900–1901），京華國都，兩度淪陷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，我國家受盡凌侮，此為近世中國之罕見。全國各省志士仁人即由此驚覺，奮然起而救國，由督撫以至改革派、革命派，無不共同熱望改良中國至富強之地，求我大漢華夏各族共享安榮。此辛亥革命武昌起義，推翻滿清皇室，最終得以成功的主要動力。然革命乃破壞，推翻滿清，有待重建，此「盤古開天」，仍需「女媧補天」。辛亥雖告建元，立國共和。然時不我與，內憂外患，相繼而至，天下由是大亂。孫中山遂於中華民國建成之後，仍然繼續出力，此乃「革命尚未成功」，故「同志仍需努力」。歷民初政局至五四運動，起而號召同志反袁、反軍閥、反帝國主義，逐漸孕育出《建國方略》、《三民主義》，為新中國重建，立下民族、民權及民生三大重要建國藍圖及方向。迄今百年，始漸見中國民族國家「造國」之成形，民生日見豐足，而民權亦日受重視。清末民國，全國志士仁人追求國家「現代化」之富強想望，於今始見端倪。其間百年歷程中，由起念，追求，試驗，失敗，成

功，歷盡無數艱辛、酸甜苦辣，辛亥革命以降的百年中國，譜寫了中國蛻變的樂章，也造就中國「火鳳凰之再生」之重大經歷。至今踏入 21 世紀，始見盛世之曙光。

若以 1895 年甲午戰爭及香港興中會總會之創立，至 1912 年清室之退位，作為辛亥革命運動之起迄，前此百年始於嘉慶六年（1796）川楚白蓮教亂起，至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對日戰敗，為清室由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（1662—1722，1723—1735，1736—1795）三朝盛世轉衰之時期。而由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至今百年，則為歷經 20 世紀上半葉民國內戰及日本侵華的大動亂，轉而至 1949 年新中國建立至今，漸見兩岸中、台、港、澳四地之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及文化邁向現代化，是為由亂入治之時期。辛亥革命前後各二百年中國之發展，其歷史形態明確地顯示：乃由盛轉衰，而繼之以由亂入治，而繼之以由亂入治的中樞。

就中國之領域而言，前此清朝立國版圖，為本部十八省及藩部之蒙古、新疆、西藏；而今日之中國「範圍」則漸見擴大，包括兩岸中、台、港、澳四地及亞非、歐美、澳紐五大洲之海外華人。就後者而言，此為辛亥革命前後百年由盛轉衰，由亂入治，促成國人流徙四方，出現「華人」全球性之大遷移。其中顯例，即為 1899 年福州黃乃裳（1849—1924）主張移民南洋，開闢新天地，積聚人才與錢財，使日後可以「整理我華夏既殘之局」，回饋祖國。此後國人隨着戰亂離開國土，流移海外。漸由前此國族之花果飄零，而至今得見開枝散葉，亦見海外華人之相繼回饋祖

國，其中「華僑乃革命之母」一語，最能證明。故中國已非傳統之一個狹義中國，而為現代廣義之大中華，此即本土與海外「華人」兩元體系之形成，此當為辛亥百年前後之大變。

本書所收集之辛亥革命群像，包括統治階層、改革與革命三方面的部分人物。涵蓋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精英之活動記錄，無疑使百年後的我們，得以重溫辛亥時期歷史人物的風貌，藉此刷新我們對其時大變革歷史記憶，書中人物的志節與成敗，無疑為中國這一古老國家及民族的生命得以延續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身影及精神亮光。這也許是本書出版的意義之所在。

是為序。

李金強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）

2011年6月27日

序二

6月某日，本書《辛亥人物群像》的其中兩位編著者蔡思行先生和區志堅博士持文稿來公司探訪，並希望我為之序。我聽到他們說明出書之原委，非常感動。區博士三十許，蔡先生未足三十，而另一位編著者彭淑敏博士也是三十許，這年齡不正是辛亥時期參與革命者的年齡？他們的熱情和堅持不也正是當時那個火紅年代，燃燒了神州大地的熱情和堅持？

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匱乏的。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，全世界的華人社會都在鉤足全力，用盡心思來紀念這個偉大的年份。對於三位青年學者而言，還有什麼比用這種方式更恰當的呢？

我在兩岸都拜讀過不少類似的作品，但此書可讀性與學術性兼顧，卻是僅見。在百家爭鳴、汗牛充棟的香港出版物中，相信可收「一紙風行」之效。

書中收集了辛亥時期有關的代表人物共六十六位，由不同人士或學者來編，可能選擇的代表人物會有出入。這不要緊。重要的是這本書會引導讀者產生極大的興趣和好奇心，以進入辛亥革命甚至中國近代史的大門。

一直以來，我對香港的歷史學界有很深的期待。香港以往被稱為是一個「借來的時間」、「借來的地方」，甚至是「借來的人群」，其特殊性可見一斑。因此香港自始就扮演着一個前所未有、與眾不同的角色。在上個世紀中葉大陸政權變易之後，很多了不起的學者如錢穆、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徐復觀等選擇兩岸以外的第三地——香港，發展現代新儒家思想，希望為中華文化保存命脈，為苦難的中華民族尋找方向。現在「花果飄

零」的中華民族終於有機會看到華枝春滿、花團錦簇的氣象。

兩岸的歷史研究受制於政治，多從本身的角度來着手，難免失之於過度主觀或流於「傲慢與偏見」。有時研究同一歷史事件，必須分析兩岸文獻，求其「史源」，披荊斬棘，突破重重障礙，方可找到正確路向，發掘歷史真相。海外學人，雖有「客觀」環境，但鞭長莫及，亦難掌握全貌。香港學人，居此福地，能入乎其內而出乎其外，必可發揮各種優勢，運用豐厚資源，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開闢一條嶄新的無礙大道。

盼共勉之。

潘漢唐（亞太台商聯合總會會長）

2011年7月3日謹識

導言

辛亥革命及其意義

2011 年為辛亥革命百周年的重要年份，中國及海外各地均舉行了很多「辛亥百年」的研討會、分享會及展覽，讓我們重回 1911 年的歷史現場，重閱時人的言論，不少時見更可以作為百年以後的借鑑，發揮史學「資治通鑑」的功用。

很多學者已指出重溯昔日的言論，就是一種歷史記憶的研究方法。歷史記憶之所以值得再三研究，在於不同的人物參與其事，當中有不同的政見及立場，後人對此不斷閱讀、理解、詮釋及再研究，他們都可能加入建構「辛亥」傳統的隊伍中。不管是主張繼承，還是批判，這也是參與「辛亥」研究者的共同歷程；不少學者提出要「超越辛亥」，其實亦先要理解「辛亥」前後的歷史環境、參與者的政治立場和生平。對於「辛亥革命」，若只視為 10 月 10 日（農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）發生的一個「事件」，則此事已去，但經幾代學人的研究，「辛亥」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料庫。對於 21 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發展而言，「辛亥」更成為了解當代中國發展源流的重要鑰匙。

狹義的「辛亥革命」，是把「辛亥革命」視為一個事件，只是指稱武昌首義一事；若我們把「辛亥革命」視為一個「時期」，此「時期」自 1895 年清廷海軍敗於甲午之戰起，至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，孫中山在南京擔任臨時大總統，改用陽曆止，視之為一段時間光譜，把關鍵人物、關鍵觀點，重現在今天整理的人物傳記中，則更可以進行有趣的古今對話，藉閱讀人物傳

記，達到國學大師陳寅恪所言「神遊冥想，與立說之古人，處於同一境界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，表一種之同情，始能批評其學說是非得失，而無隔閡膚廓之論」。先了解光譜內時人的言論，自可知其受時代所限，以持平的角度，繼承先賢的精要。論世必先知人，傳記發揮了言簡意賅，直接觀看辛亥時人面相的作用；也因延伸了時代光譜，人們生活在固定的歷史場境之中，藉介紹人物生平，以小觀大，自可展示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、政治經濟等情況。¹

本書收錄的人物，也是自 1895 至 1912 年，主要突出在此光譜中，這些人物的思想、生平及其在辛亥革命時期扮演的角色，以人物的生平展示時代的面貌。為何 1895 至 1912 年這階段很重要？自甲午之戰中國被日本所敗，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被日本取代，更暴露中國衰弱的情況，列強加緊侵略中國，興建鐵路及劃分勢力範圍。甲午戰敗和瓜分中國的危機，對中國人的影響層面非常廣泛。嚴復於 1895 年刊〈論世變之極〉，1896 年初譯《天演論》，康有為於 1895 年組織「公車上書」，1896 年撰《孔子改制考》，梁啟超於 1896 年編著《變法通義》，1898 年張之洞也刊行《勸學篇》，其後便是戊戌政變，康、梁逃離中國，而 1895 年後，報刊數量較昔日大增，

1 有關人們藉回憶與先賢同遊，以同情及體諒的態度了解一個時代的面貌，參陳平原：〈文本中見歷史細節處顯精神〉，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 1–9。

主持者由傳教士或買辦而改為土紳，影響至今的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及世界書局也是在 1895 年後成立，新式印刷術、新編教科書、新報章及刊物、新式學堂、學會以及現代知識階層均在 1895 年後出現，促成中國政情和民生等各方面重大改變。甚至孫中山的「民族、民權、民生」三大主義也是於 1905 年在東京《民報》上發佈，可見推動中國走向近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及言論，多在 1895 年後出現。然而，正如近代史研究專家郭廷以先生所言：「自武昌起義至清廷遜位，在短短四個月內，三千年的中國君主政體一變而為民主政體」，故 1912 年民國建元，從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體制發展而言，可謂結束了舊體制，開始了新體制，而 1895 年至 1912 年可視為朝向辛亥革命發展的方向，此階段中國也經歷了甲午之戰後的政局，列強加速侵略，百日維新，戊戌政變，義和團事件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晚清改革及 10 月 10 日的辛亥革命，知識分子面對每一歷史事件，作出深刻反省，態度也日漸激烈，終致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，走上共和政體的發展方向。²

辛亥革命後，中國仍陷於舊制度已破壞、新制度未建立的變亂之中，出

2 有關本文以 1895 至 1912 年，為一個時段的劃分，主要從政治及政體發展上作考慮，見郭廷以：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6），下冊，頁 411；又郭氏把明末至 1911 年辛亥革命列入《近代中國史綱》上冊收錄的內容，而此書的下冊包括 1912 年民國建元至 1949 年海峽兩岸國共政府分立，可見 1912 年也是近代中國分水嶺；另參見考 Mary Wright (ed.), *China in Revolutions: First Phase, 1900–1913* (New Haven,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68) 一書的導言及此書收錄的論文。

現袁世凱及張勳復辟，更有二次革命，孫中山也深感其時「人民深遭痛苦，乃責革命家之造亂」。然而，無可否認辛亥革命為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，它不但結束了君主專制政體，更是走向民主共和、建立近代民族國家 (nation-state) 的政制及其精神價值：人民從帝制時的「臣民」走向「國民」的身份轉變；傳統「家天下」和「忠君」觀念，不再成為主導政治的力量，以皇帝為中心的「普遍王權」崩潰，傳統道德文化也受到衝擊；同時，新文化成果方面，革命派以圖畫、小冊子、報刊、戲曲等媒介宣傳革命，不論立憲派及革命派都努力辦報，傳播新學及自由民主思想，啟迪民智，提倡男女平等，這均使全民參政意識日益濃厚。革命派用來指導革命的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民主義綱領，確立了中國走向獨立國家、注重人民生活及自由民主的方向，這又為日後五四運動播下種子。

當代學者張灝從政治文化及學術思想的發展角度，視 1895 年至 1925 年為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「轉型時代」。³ 在這個「轉型時代」裏，自 1895 年至 1912 年民國成立，正代表了辛亥革命時期，此光譜內政治及政體變動下，經濟、社會及文化等各方面也隨之變動，辛亥革命也標誌結束中國帝

3 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把 1895 年至 1925 年列為「轉型時代」，見張灝：〈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〉，《時代的探索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．聯經，2004），頁 31–60。進一步演繹張氏的論點，見王汎森等著：《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：張灝院士七十秩祝壽論文集》（台北：聯經，2007）一書收錄的論文。

制，走向共和憲政之路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更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四大變動——秦漢帝國的建立、唐宋變革、明末清初的轉換、清末民初的激變，而導致第四次變化的，就是 1911 年辛亥革命，它標誌了中國政治文化走向新紀元。⁴ 研究辛亥的專家章開沅教授已於 2010 年提出研究辛亥革命要將三個百年相聯繫，辛亥革命同以前的百年，辛亥革命到現在百年，及未來百年結合起來思考，以見辛亥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。可知中外史家視辛亥革命為近代中國史的研究重點，也可見從歷史洪流中重溫辛亥百年的意義所在。

辛亥革命於 1911 年 10 月 10 日在武昌發生

武昌位於湖北省，明清時，湖南及湖北均同屬於一個行政區，兩地經濟、文化、政治上關係密切，故有學者曾以「辛亥革命在兩湖」為題，進行專門研究。要了解辛亥首義在武昌發生的原因，需要注意兩湖在革命前的地理環境及時代背景。

兩湖在近代中國對外開放後，漢陽鐵廠、萍鄉安源煤礦相繼發展，岳州與長沙相繼開埠，兩湖成為長江的航運中心。湖廣總督端方更認為鐵路的興建，使武漢成為南北交通貿易的樞紐，「天下大勢日趨重於鄂中」。而位於

⁴ 見溝口雄三著〔林少陽譯〕：〈辛亥革命新論〉，載陳光興、孫歌、劉雅芳編：《重新思考中國革命：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》（台北：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，2010），頁 110–119。

兩湖一地的武昌、漢口及漢陽既為長江腹地，經濟及人口集中的重要區域，亦成為不少工商業者、知識分子、會黨、農民雲集的地方。因此，兩湖的環境，一方面領全國風氣之先，成為歷來洋務運動、維新運動的引領者；另一方面，兩湖思想開放、經濟蓬勃的條件，亦成為辛亥前後會黨秘密活動、新軍起義不可或缺的土壤。

適合的土壤、已播下的革命種子，亦需要足夠的雨水、肥料才能開花結果，保路風潮正好擔當這樣的角色。1903年，清廷頒佈《鐵路簡明章程》，允許全國各地商人集資興建鐵路，推行「官督商辦」營運模式。然而，列強希望藉着奪取鐵路的修築權和管理權，將勢力打入中國內地。當時晚清政府中央財政困難，加上將地方財政集權中央的趨勢日熾，因此向外國銀行借洋款修築鐵路，列強遂有權任命鐵路總工程師等職位，變相「官督洋辦」，損害投資鐵路的華商利益，終引起各地的保路運動。1908年清廷諭令查驗各省商辦鐵路工程，要求各路限期完成，若資金不足，管理不善，便撤銷原商辦鐵路的方案。1909年，張之洞與英國匯豐銀行等財團簽訂湖廣鐵路借款草約。1911年1月，清補授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為郵傳部尚書，準備實行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。5月9日清廷下旨宣佈粵漢及川漢鐵路收歸國有，端方接收兩路事宜，盛氏更與英、美、德、法四國銀行簽訂《英法德美川漢、粵漢鐵路借款合同》，正式接收商辦的鐵路，多個省份的人民激烈反對。由立憲派把持的各省諮詢局充當了這場保路運動的領導核心。5月14日，湖南各界在教育總會召開全體大會，反對鐵路國有政策。

鐵路國有在四川更激起反抗，早前川督錫良創設四川川漢鐵路公司，經營不善，已引起四川士紳不滿，於 1907 年改為商辦，並發「租股」，規定川內凡收租在十石以上者，按年實收的數值百抽三，使當地的士紳收入大受影響，士紳把經濟負擔轉給農民，加速了保路風潮在四川的發展。四川的立憲派更關心路款問題，清廷將已用和未用的路款一律換發給國有鐵路股票，不退還現款，欲以鐵路資產作抵押來借洋債，使已投資鐵路的川民血本無歸。6 月 13 日，在諮詢局士紳的倡導下，成立川漢鐵路「保路同志會」，但清廷態度並未軟化，更辭去體諒民情的川督王人文，改任趙爾豐。8 月，各股東代表齊集成都，民間發起罷市及罷課，但趙氏命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平亂，又拘捕保路運動的首要人物蒲殿俊、羅綸等人，成都民眾要求釋放被捕諸人，但趙氏竟然下令機槍掃射請願民眾，死者達三十多人。發生慘案後，在同盟會及哥老會的領導下，各路民軍包圍成都。9 月，四川政府已陷入混亂狀況，端方率領湖北軍入川，但不少軍人已受革命思想的影響，端方也於武昌起義後，在屯駐的四川資州被殺。

在端方率軍入川之時，與湖北新軍關係密切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於 9 月 24 日舉行聯合大會，決定在 10 月 6 日起事。在舉行大會的同一日，駐湖南的新軍第八標炮隊三營有兩名士兵請假離營，一些士兵為他們宴別，忽然被一名排長干涉，士兵不滿，在霍殿臣率領下，欲拉炮攻城，因無炮彈，只好棄炮而走。起事的消息已洩，革命黨人決定延至 10 月 11 日才行動。10 月 9 日，孫武等人在漢口俄國租界寶善里十四號機關製造炸彈，不慎

起火，孫氏等人逃離，俄國巡捕取去革命軍人未及時轉移的文件。俄租界巡捕把文件交給清吏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關閉城門，搜捕革命黨人。武昌不少革命機構因此受到軍警查抄，瑞澂又準備依所搜到的名冊捉拿黨人，引起革命士兵的恐慌，未參加革命的士兵也恐受到牽連，故各自聯絡，相約於 10 月 10 日晚上 12 時起事。

當晚 7 時，駐城外塘角的混成協炮、工各軍隊提前行動，首先舉火為號，炮隊和工程隊分別響應。在城內，駐中和門內的第八鎮工程第八營首先發難，正值熊秉坤趕到，見全營騷動，即時起事，營房的彈藥全被起事的士兵所取。至 10 時左右，起事軍開始進攻總督府，督署受炮火所害，瑞澂逃走。黎明時分，武昌已落入起事的士兵手上，其他黨人相繼於 11 日夜及 12 日，控制漢陽及漢口，武昌「首義」成功了。10 月 16 日大批北洋軍南下，保衛武漢成為革命軍的主要任務，革命軍與清官軍展開激戰，而在武昌首義後五十天內，先後有湖南、陝西、江西、廣東、山西、雲南、貴州、上海、浙江、江蘇、廣西、安徽、福建、四川宣告獨立，促成辛亥革命的成功。

革命的成功除了新軍及會黨的力量，也要注意地方都督及士紳等團體付出的努力。同時，若從歷史長河中觀察，早前的日知會、同盟會湖北分會、群學社、共進會、文學社等各社團的付出，湖北立憲派由「哀請立憲」至「推